

# 晚清經濟史研究範式再討論

## ——從彭黃之爭談起

● 李忠林

黃宗智和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有關中國前近代社會發展路徑的爭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相關評述<sup>①</sup>，凸現了當前晚清經濟史研究中一個不可迴避和亟待解決的學術疑問：近代化的內在邏輯是甚麼？這一問題還可以逐層分解為：(1) 是否存在外歐洲(至少是英國)的近代化路徑，亦即近代化路徑的一元與多元問題；(2) 無論一元還是多元，近代化發生的歷史和邏輯前提是甚麼？我以為第一個問題包含了捍衛、漠視抑或顛覆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隱喻，並據此與民族主義和反民族主義相聯繫。第二個問題是一個更具體的理論問題，它在追問：我們是否對黃宗智的「內捲化」理論進行最後的清算，進而從理論上尋找新的學術支撐。

基於基本的學術理念，我們應該把十八世紀的江南與同期的英格蘭放在平等的地位去討論，因為這兩個社會經濟體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可以成為歐亞大陸兩端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區。由於西方世界走過了一個如此輝煌的十九世紀，在研討中，我們有意無意地偏離經驗事實便不可避免。從行文

來看，彭慕蘭似乎更多地遵循了這一約定，而黃宗智則偏離了我們所要求的學術立場。黃在〈發展還是內捲？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以下簡稱〈發展〉)一文中談到<sup>②</sup>：

內捲化農業構成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落後的中國近代經濟這一矛盾事實的基礎。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給所控制的前工業化地域範圍內，一個擁有(非內捲的)一百萬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餘的地區，可以供給一座三十萬人口的城市(即相當於中世紀倫敦的規模)；而擁有內捲化了的一千萬人口以及只有10%剩餘的同樣面積的地區，則可以供給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長安鼎盛時的規模)。

我們注意到黃在這裏是把唐代鼎盛時期的長安和中世紀的倫敦作為喻體來指稱的，但我們同樣注意到黃的表述前提：「內捲化農業構成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明與落後的中國近代經濟這一矛盾事實的基礎。」由此我們能夠看出黃的邏輯：江南的內捲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似乎近世中國農業的內

黃宗智和彭慕蘭有關中國前近代社會發展路徑的爭論，凸現了當前晚清經濟史研究中一個不可迴避和亟待更深度研究的學術疑問：近代化的內在邏輯是甚麼？這一問題還可以逐層分解為：(1) 是否存在歐洲以外(至少是英國)的近代化路徑，亦即近代化路徑的一元與多元問題；(2) 無論一元還是多元，近代化發生的歷史和邏輯前提又是甚麼？

捲有着民族必然性一樣。把近世江南農業的內捲化——如果有的話——延展到中世紀的中國(如唐代的長安)無論如何都是有些不正常。因此，我們要問，彭慕蘭的觀點——在黃看來，「甚至可能引起某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共鳴」<sup>③</sup>，如果其所指非實的話，那麼黃的觀點是否能夠延展出某種反民族主義的立場呢？

為了比較的方便，彭慕蘭在〈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以下簡稱〈世界〉)一文中以每個勞動日創造的人日口糧為基準，經過修訂和保守計算得到：「每個江南居民每年的工作日為五十天，其中仍然只有三分之一投入糧食生產。」<sup>④</sup>考慮到江南的糧食消費有22%(肯定不低於15%)是輸入的，對這個數值進行修訂也得到江南總工作日38%用於糧食生產的數值<sup>⑤</sup>。另一方面，瓊斯(Eric Jones)的數字表明，直到1801年，英格蘭種植業的勞動力比重下降至36%；至於法國，格蘭瑟姆(George Grantham)的估計為26-47%<sup>⑥</sup>。這樣看來，江南與英格蘭用於糧食生產的勞動力比重大致相當，雙方都有60%以上的勞動力開始脫離了農業生產，唯一的差別在於勞動力脫離農業的方式。據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估計，1843年「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人口(有二千名居民以上的城鎮)約7.4%<sup>⑦</sup>，他後來又將這一數字修正為9.5%<sup>⑧</sup>。據瑞格里(E. Wrigley)的統計，1801年英國有27.5%的人口生活在五千人以上的城市<sup>⑨</sup>。儘管曹樹基在《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對中國情況的估計要比施堅雅的估計樂觀一些，但與瑞格里對英國的統計相比，其差距依然非常明顯<sup>⑩</sup>。問題是這一差別的意義是否非常重大，正如瓊斯所指出的那

樣，對於一個人民從事混合職業的社會來說，我們需要的生產率計量標準是勞動日中用於種植業的比重。事實上，我們關心的是農業生產能釋放出非農業勞動力的比率，而這些勞動力是以何種形式存在並不很重要。

在黃的〈發展〉一文中，他認為在棉花的種—紡—織三位一體的生產體系中，勞動力的投入將明顯增加，與水稻的勞動投入相比為18：1，與小麥的勞動投入相比為27：1；植桑的情形也同樣體現了勞動力投入增加的事實，其與水稻的勞動力投入相比為9：1，與小麥的勞動力投入相比為13.5：1。我們看看彭是怎樣看待這一問題的。首先，彭慕蘭恰當的指出，黃錯誤地使用了勞動／土地比率而不是勞動／產量的比率。在經濟生活中，人們更關心勞動與產量的比率，即投入產出關係，而不是勞動力在土地上的分配密度。通過這樣的思路調整，彭計算得到「棉花的種—紡—織綜合體一天勞動增加的價值，約等於穀物栽培一天勞動增加價值的50%」，即2：1的關係<sup>⑪</sup>。隨後引入資本投入、淨生產率的因素後，彭認為還要進一步下降，並一再聲稱依然沒有考慮婦女勞動量與成年男性勞動量的折算。彭還把植棉並織布的江南農戶的掙錢能力與同期英格蘭紡織工人的情況進行了比較。經過折算得到江南農戶每天的穀物收益為十三鎊，由此可以看出江南植棉並織布的農戶其收入不低於(甚至高於)英國倫敦織工的收入(十鎊至十二鎊)，更不要說農業工人與農村／小城鎮織工了(五鎊至十鎊不等)<sup>⑫</sup>。

通過以上對彭黃兩人計算資料的扼要摘錄之後，我們可以據此展開一些討論。黃宗智所謂的內捲(即沒有

彭慕蘭指出，黃宗智錯誤地使用了勞動／土地比率，而不是勞動／產量的比率。在經濟生活中，人們更關心勞動與產量的比率，即投入產出關係，而不是勞動力在土地上的分配密度。彭還把植棉並織布的江南農戶的掙錢能力與同期英格蘭紡織工人作出比較，可以看出江南植棉並織布的農戶收入並不低於英國倫敦織工的收入，更不要說農業工人與農村／小城鎮織工了。

發展的增長)顯然依賴以下兩個事實：(1) 種植業(水稻、小麥)中勞動投入的過密導致邊際收益的下降；(2) 由於紡紗等手工勞動的低效率，植棉—紡紗—織布三位一體的作業體系的引入加劇了邊際收益的下降。事實上，黃從來沒有給出過密的參照標準——無論是數量上還是邏輯上的。如果所謂過密是與同期歐洲的發達地區——後者因為在十九世紀的成功而進入人們的視野——如英格蘭進行比較，上引彭的計算可以證實這是一個幻覺。首先，在十八世紀，英格蘭的農業生產釋放出非農業勞動力的能力與同期的江南是持平的，前者為64%，後者為62%，這正好說明了雙方具有大致相同的生產效率<sup>⑩</sup>；而到了手工業這裏，上引江南植棉織布農戶的工資收入與同期英格蘭工人工資的比較，也可以看到大致相當的生產效率。假如我們把目光放在同一地區(江南或英格蘭)種植業與手工業生產效率之比上來時，或許能夠看到內捲的影子，即手工業(紡織業)中的一天勞動增加的價值約為種植業的50%<sup>⑪</sup>，但這並非十八世紀的江南與英格蘭的差異，而是同一地區內部種植業與手工業的差異，如果據此能得到江南手工業收益出現內捲的結論，那麼，英格蘭也應該有着同樣程度的內捲。

事實上，對於前近代經濟而言，在沒有重大的技術革新發生之前，手工業加入農業後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是很正常的事情。基於經驗事實，農業中的勞動力追加從來都不是無限制的，引入手工業可以為從農業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反過來，手工業隊伍的壯大可以優化產業結構，為技術革命積蓄力量。因

此，這種邊際報酬遞減的事實會被當時的社會毫不猶豫地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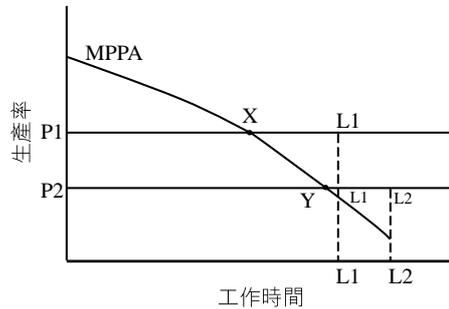
我一直懷疑在以糧食作物為主的種植業中引入邊際收益是否恰當或者在甚麼意義上恰當。種植業中的勞動投入和工業中的勞動投入從形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眾所周知，經濟學中的邊際革命發生在工業企業有了相當程度發展的十八世紀中葉，這一事實正好說明邊際理論是建基於工業企業生產經驗之上的經濟分析理論，是否能夠不加修正而徑直運用於種植業的經濟學分析，值得深思。經驗事實告訴我們，農民在種植業(無論水稻還是小麥)中投入的勞動量往往是固定的(除非出現重大的技術變遷)。這樣的工作量既不能減少也不能增加。比如，一畝地打穀需要一天時間，減少這一天，他的農業收益可能為零，如果增加為兩天，他的收益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根據我的經驗，即使最落後的農民，他關注的問題也絕不是在土地上追加多少勞動力(在他看來這是基本固定的)，而是追加或減少資本投入(如肥料、灌溉、畜力的引入等)。

回頭來看，黃宗智所謂的「內捲」或「內捲型商品化」只是一個學術幻語，它既不存在於十八世紀的江南，也不存在於同期的英格蘭，更不存在於上述任何一個地區中手工業向農業滲透的過程中。如果非要使用這一概念的話，它應該指十八世紀的一種普遍面臨的社會經濟現象：在這個時代，農業中釋放出的大量勞動力應如何安排才可以克服邊際收益倒退的經濟事實，而這種倒退來自於手工業向農業中的滲透。

彭在消解了黃的「內捲化」理論之後，闡明他的有關勞動力在農業和手

事實上，對於前近代經濟而言，在沒有發生重大的技術革新之前，手工業加入農業後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是很正常的事情。黃宗智所謂的「內捲」或「內捲型商品化」，只是一個學術幻語。如果非要使用「內捲」這一概念的話，它應該指十八世紀一種普遍的社會經濟現象：即在這個時代，應如何安排從農業中釋放出的大量勞動力，才可以克服經濟邊際收益的倒退。

一個商業化經濟中農戶勞動力  
配置的簡單模型



註：MPPA=農業勞動力的實物邊際生產率  
資料來源：彭慕蘭：〈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37。

工業中的配置模式。彭慕蘭是通過如上圖表來說明的。

曲線MPPA代表在一定的土地供給、技術條件下，農業勞動追加投入的實物邊際收益逐漸減小。直線P1代表手工業生產中勞動追加投入的邊際收益，按照一定日期流行的米價和布價換算成米。當曲線MPPA落到P1及其以下的水平時，農戶把更多的勞動投入農業就不再有意義，他轉而把勞動投入手工業。P1-L1所代表的勞動總量可以分為兩段：在於MPPA相交點左邊的一段代表投入農業的勞動數量，右邊的一段代表投入手工業的勞動數量。當布價相對於糧價明顯下降至P2線上時，曲線MPPA與那條線相交點之前的長度就會更長，人們因此會把更多的勞動投入到農業。如果這裏討論的人能夠或者願意工作的總勞動時數是固定的，那麼供給手工業的勞動就會收縮一點，如果他們絕對必需得到一筆數量確定的收入，而這在L1點上又無法滿足，他們就會不僅幹更多的農活，還要做更多的紡織工作，總勞動供給就會移動到L2<sup>⑮</sup>。

在這個分析模式中，我們看不到人口壓力的存在，它能夠很好地說明

相對於農業的工業勞動生產率的重大意義：當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時（從P2到P1），由於農業中較低的邊際報酬（實際上應該是平均報酬），將會發生手工業與農業在絕對意義上的分離；而當手工業相對生產率下降時（從P1到P2），農業和手工業將會同時發生勞動密集。

顯然在這裏兩個因素尤為重要，這就是工業技術和貿易。基於工業技術的重要性從來未被人忽視這一事實，彭着重討論了貿易的影響。他指出了十八世紀末江南和英國所遇到的迥然相異的貿易環境。江南在1750-1840年間發生的情況是：它在華北和長江中上游和其他地區的貿易夥伴經歷了迅速的人口增長和棉布產量的巨大增長，因而既減少了可供輸出的糧食和木材剩餘，也減少了對江南紡織品的需求。與江南不斷惡化的貿易環境相比，英國仰仗於新大陸和海外殖民地的巨大輸出，對外貿易呈現出良好的增長態勢。除了良好的貿易環境外，以煤炭為代表的能源及其連帶的技術革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們從彭而不僅僅是從黃的解釋中走出來，重新審視十八世紀末期由勞動密集、實際工資停滯或略有下降和生活品質下降所構成的這一綜合社會問題時，我們似乎更應該換一個不同的視角。

我們首先要將邊際理論引入小農家庭型的種植業生產這一做法給予否定。事實上，耕種一定面積的土地（無論水稻、小麥或二者複種），在技術因素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其投入的勞動量往往是固定不變的。比如，耕種小麥需要七個勞動日，追加第八個勞動日完全沒有意義，其邊際效益（如果存在的話）幾乎為零。另一

十八世紀末中國江南和英國遇到迥異的貿易環境。江南及其華北和長江中上游和其他地區的貿易夥伴，經歷了迅速的人口增長和棉布產量的巨大增長，因而既減少了可供輸出的糧食和木材剩餘，也減少了對江南紡織品的需求。英國仰仗於新大陸和海外殖民地的巨大輸出，外貿持續擴張。除了良好的貿易環境外，以煤炭為代表的能源及其連帶的技術革新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方面，亦不能減少哪怕一個勞動日，這將導致整體收益為零。對於個體小農而言，相對於資本(如肥料)或其他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才有意義。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和江南都有大約六成以上的人口從農業中釋放出來，被迫轉入到邊際收益更低的手工業(紡織業)——從而顯示為勞動密集和實際收入下降。由於農業中勞動力的不可追加性，這不僅說明種植業中的內捲之不可能，也說明這種六成以上勞動力尋找新的就業管道的圖式是一個剛性結構。新興的手工業正在試圖吸納這些勞動力，而這種吸納有兩個「不良」的社會表現：(1) 整個社會生產中邊際收益的普遍下降；(2) 部分人口因失業而絕對貧困，同時人口相對過剩。第一個「不良」表現在黃宗智那裏被理解為內捲，而按照彭的研究卻並非如此。第二個「不良」表現被理解為馬爾薩斯型危機，而彭慕蘭根據施堅雅的研究推論1776-1850年間，三角洲的人口增長率幾乎為零<sup>⑩</sup>。

因此，我們認為，由於傳統農業在十八世紀末期達到技術頂峰，在沒有出現新的技術突破之前，單位面積上有效的勞動需求基本固化。如果接受六成以上非農業人口被農業承載的資料，這一時期的英格蘭和江南的人口格局已經剛性化。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危機只是相對過剩造成的錯覺，手工業的引入導致了勞動生產率的有限下降這一事實不能理解為內捲。十八世紀末期歐亞大陸的兩端都需要從工業技術到制度安排上尋找突破，這應該是當時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主題。至於如此後的歷史所表明的那樣，英國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自然應該從雙方技術突破和制度革新中去理解，而不能從農業和早期手工業的發展中去尋找答案。

## 註釋

① 王家範：〈中國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第4期，頁46-52；趙岡：〈過密型生產模式的提法錯了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1-3。

②③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捲？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頁158；150。

④⑤⑥⑩⑫⑬ 彭慕蘭：〈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綜合觀察——回應黃宗智先生〉，《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8；9；8；10-11；37；33。

⑦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29.

⑧ G. William Skinner,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7, no. 2 (December 1986): 75.

⑨ E. Anthony 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5, no. 4 (Spring 1985): 688, 700-701, 723.

⑩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第17章。

⑪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Rethinking W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South India", *Past and Present*, no. 158 (February 1998): 79-109.

⑫ 彭慕蘭在〈世界〉一文中的另一個估計數字也能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江南水稻種植每個勞動日可以產出約22.5人日的口糧，而英國則是21人日。

⑬ 彭慕蘭在〈世界〉一文中估計在穀物種植與棉花種植(含加工)中，每個勞動日增加的價值比為2：1。

在十八世紀末期傳統農業沒有出現新的技術突破之前，單位面積上有效的勞動需求基本固化。十八世紀末期歐亞大陸的經濟都需要從工業技術到制度安排上尋找突破，這應該是當時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主題。至於對此後歷史所表明的英國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自然應該從雙方技術突破和制度革新中去理解，而不能從農業和早期手工業的發展中去尋找答案。

李忠林 1970年生，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巢湖學院歷史系教師，主要從事中西文明比較研究。